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四二期 ——  
(二〇一〇年三月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003b)

---

【自由论坛】	毛泽东为何不惜全国“大乱”也要搞文革？	金冲及
【一家之言】	《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序言	辛子陵
【春秋史笔】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文摘（之二）	周良宵·顾菊英
【文献资料】	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	
【前事不忘】	从德国经验看文革	苏晓康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自由论坛】

毛泽东为何不惜全国“大乱”也要搞文革？

• 金冲及 •

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预感到一场凶猛的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这些文章在知识界中震动很大，但社会上大多数人仍不那么注意，从事行政、经济工作的人也以为同自己关系不大，仍在忙各自的业务工作，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看来，这样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黑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新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做法已不行了。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在哪里？毛泽东抓住了两个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力量：一个是大字报，一个是红卫兵。

先说大字报。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毛泽东看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事实上是在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下写出来的。它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毛泽东觉得，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冲破原有的秩序，使群众放开手脚地行动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立刻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且发表了一篇由王力、关锋起草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给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持抵制。”谁是“应该坚持抵制”的“错误领导”？可以各有各的理解和解释。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实际上就很难继续领导，他们的话没有人听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

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议出八条指示。“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657—658页。）这些规定，自然同毛泽东的设想南辕北辙。同一天，中央在一线的领导人派出以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并向各大中学校相继派出工作组。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仍很难控制局面。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设立“打鬼台”，四处揪人，并且有社会上的坏分子混入。张承先回忆道：

“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统计，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更加恶劣的是，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四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工人刘佳宾，此人原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三个人，这一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是三十八斋前参加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并随即散去，而此人却在散会后两分钟不到，又揪来个女同志进行乱打乱斗……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一九六二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张承先回忆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34—135页）

当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由张承先讲话。工作组还作出规定：进行全系

批斗必须经系工作组批准；进行全校批斗必须经过校工作组领导批准；建立纠察队，维护斗争秩序；为防止坏人混入，对外校来声援者，安排专人热情接待，但禁止外校来人在北大揪斗人。二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把北大工作组关于这件事的简报批转全国。批语写道：“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已经出现反对工作组的浪潮。“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发生了造反派赶工作组的‘六二〇’事件。”“二十一日，清华大学也发生反对工作组的事件。这天，工程化学系二十岁的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批语，大意是：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不代表我们，要再夺取。蒯大富在前几天就提出要赶走工作组，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造反派在工作组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六月二十六日，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回首“文革”》（下），第639页）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了“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大力控制局势。

毛泽东离开北京已经半年多了。他对运动的看法和正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根本不同（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六月中旬，毛泽东离开杭州。他在湖南的长沙和韶山停留一段时间思考运动的发展趋向，来到武汉。七月六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要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后，送给江青。他在信中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

这是毛泽东多日来对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紧要关头，形势极为严峻，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无法同它相比。

只有下最大的决心，用非常的手段，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即使在“大乱”过程中造成种种损失，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毛泽东的这种看法，自然同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以维护秩序的意图直接冲突。七月十八日，他回到北京，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学生受到压制。二十五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

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

红卫兵首先是在中学里产生的。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六月二十四日，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写道：“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年第11期）七月四日，他们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许多中学内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两张大字报寄给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回信。信中说：“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7月31日）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为一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不管怎么样的事情，包括不少无法无天的坏事，只要打起“革命造反”的旗号，仿佛都是正常的，都可以任意去做。

毛泽东这样支持红卫兵，不仅因为他认为学生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后，着重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批评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话说得越来越重。八月七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在五时所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人民日报》1967年8月5日）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主要是指刘少奇，并且提出了中央另外存在一个“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它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他考虑接替刘少奇位置的人是林彪。这不仅因为林彪比较年轻，更重要的是因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同他的想法一致。这

次全会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被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把林彪称为副主席，不再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决定》强调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它写道：“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同一天，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五天后，他又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使中共中央在法定程序上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已不可避免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八月十八日，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绿军装，出席会议，在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这次大会把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更加狂热的程度。

“八一八”大会是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目的都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火越烧越旺。

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把“革命造反”迅速扩展到全社会。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制观念十分淡薄，参加行动的人员又比较复杂，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

他们到处发布通令，把许多传统的有影响的路名、商店名、医院名等斥为“封、资、修”而改换成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名称，在街上强行剪发，剪破他们认为的“奇装异服”，在“破

四旧”的名义下冲入居民住处抄家。更令人痛心的是很多处发生严重破坏法制、任意打人致死事件。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因受到人格侮辱而自杀。不少人被强行遣送回乡。党政机关的各部门几乎都因派出过工作组而遭到红卫兵的猛烈冲击，许多负责人被野蛮地揪斗和毒打。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为，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他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提醒红卫兵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从总体来说，他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压制”和“打击”。

八月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但又说：“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来一个放任自流”，也是他在八月下旬说的。事实上，在“不干涉”、“放任自流”的情况下，什么事都会发生。红卫兵中许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不法行为，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是火越烧越旺。

“八一八”大会后，另一个变化是：出现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

这样，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在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今年十一月下旬止，他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这样的全国大串连，到年底才逐步停息下来。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大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被“横扫”。相当多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攻击和责难，被迫没完没了地检讨，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这种状况不能不使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感到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多年来做过许多好事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人仍占着大多数，被称为“保守派”。群众中的两派对立日益明显。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他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干部中的抵触情绪，同前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是运动前进的主要阻力。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这年国庆时《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来的。它写道：“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会），《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

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但已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这种模糊不清的提法，可以任意对它作出各种解释。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会被围攻和揪斗。除了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使冲击面更大了。许多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被任意揪走、关押，不知下落，有的甚至被毒打致死。各地还掀起“抓叛徒”的活动，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整个混乱局面更难收拾。

中央工作会议从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是要打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负责干部的思想。陈伯达、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林彪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又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合理的。尽管群众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可以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社会上正在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也便于一些野心家假借“革命群众”的名义，为所欲为，浑水摸鱼，做尽坏事。

尽管如此，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仍思想不通，忧心忡忡。这时，不受任何约束的红卫兵普遍地对各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到处刷出某某人罪责难逃、把某某人揪出来示众之类的大标语。不少干部挨批斗，被游街。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成员也更加复杂。形形色色对社会现实存在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或过激的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已很难依靠原有的各级党政机关来实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预期目标。他已明显失去耐心。“全面夺权”的行动，正在酝酿中。

□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一家之言】

## 《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序言

• 辛子陵 •

在毛泽东思想深处，主席和皇帝是一个概念，他这个终身主席是现代皇帝的与时俱进的称谓。但他不是普通的皇帝，是具有秦始皇一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观其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套路，“马克思主义”是个装饰，是一件骗人的迷彩服，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雄才大略”尽是《韩非子》集大成的法家理论和权谋。尹振环先生的新著《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剖析“秦家店”》，对毛泽东时代的建国理论、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令人振聋发聩的揭露和批判。这对我国正在准备着手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 ◇ 从批《十批判书》说起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毛泽东公开反对孔夫子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君主本位主义。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1〕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974年1月18日发下江青主持起草的1974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置百乱待理的国计民生于不顾，转发迟群、谢静宜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批判。从此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帷幕。以后又转为颂扬法家，颂扬秦始皇、汉高祖等“法家皇帝”和吕后、武则天等“法家皇后”。慷慨的言辞，大块的文章，如蝟如蟥，如沸如羹。毛泽东要借用秦始皇的服装，演出中国历史的新场面，为建立毛氏王朝，为传位于当今的吕后——江青，大造“革命”舆论。

1974年1月25日，江青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上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前竟没有给周恩来打个招呼。会上，江青以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姿态，操纵会议，周恩来被置于受江青领导和指责的屈辱地位。江青端坐在主席台上，让迟群（中央警卫团的科长）、谢静宜（江青的机要秘书）两个小人物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攻击一国总理周恩来，她要用这个办法表明自己将代替毛泽东君临天下。

笔者是会议的参加者。目睹江青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叫八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站起来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对清廷的“大学士”那种派头。她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她像口宣圣旨一样读一段语录：“我们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夠，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25日晚上，周恩来派秘书到郭宅安慰郭沫若。秘书说：“总理说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郭沫若和于立群十分感激，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过了几天，张春桥造访郭沫若。认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谁都知道，郭沫若在大后方从事的史剧和史学活动，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周恩来曾以朋友身份进行支持和鼓励，与王明毫不相干。郭沫若据理反驳后，张春桥又提出要郭沫若写一篇文章，“骂秦始皇那个丞相”，拉郭反对周总理，郭断然拒绝。郭沫若一辈子拥共拥毛，与毛泽东诗文唱和，友谊甚笃。到了耄耋之年，无权无势，只因在1945年写了《十批判书》，揭露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中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戳穿了“君人南面之术”中最诡秘的东西，而这些正被毛泽东当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推到历史的前台，所以为毛泽东所不容。

今人多对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屈服和奉迎有太多的微词，以至于将他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贡



献忽略了。《十批判书》是好文章，比起“梁效”、“罗思鼎”那些批孔扬秦的文章来，要高超百倍。当然，郭沫若如仍有北伐途次中的豪气，像与蒋介石决裂时写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那样，再写一篇《请看今日之毛泽东》，断然与毛决裂，流亡海外，那将给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人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对晚年的郭老不能如此苛求。令人欣慰的是，郭沫若有了接棒者。对秦始皇和法家的研究和批判，类似《请看今日之毛泽东》的著作，由尹振环先生完成了。尹先生以如椽大笔，清理了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在不分精华和糟粕的复古浪潮中，尹先生继承了郭沫若的人民本位主义，对皇权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地鞭笞和彻底地否定。他说：

中华民族迟早有一天会对帝王文化发起群起而攻之的，再有毛氏复生，也会天下共击之的，但那还得首先赖于学界的研究与批判帝王文化。只有这样，像美国那样“永远毫无拘束的批评政府，批评领导人”，才有可能在中国逐渐形成。

#### ◇ 丢了真理迅速占领“势”的制高点

先秦诸子百家是一群游说王侯如何扩充领地完成霸业、如何统治人民治理国家的知识分子。韩非（公元前280～233年）脱颖而出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受到秦始皇的青睐。据传秦始皇看到韩非的著作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2）韩非的学说得到秦始皇的采纳，成了秦皇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建立统一的大帝国的理论根据。

法家的理论是专为皇帝一个人设计的。讲的是如何坐稳龙廷、如何驾驭群臣、如何统治百姓的秘笈。皇帝的龙廷都是坐北朝南的，所以叫做“君人南面之术”。郭沫若认为韩非是法术家。（3）管仲（？～公元前645年）、商鞅（公元前390～338年）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韩非的贡献主要在“术”的方面，这个“术”的含义就是我们现在用鄙视的眼光看待的阴谋权术。郭沫若说：

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玩弄起来，似乎很不容易捉摩。韩非自己也说过：“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经》、《因情》）不过，无论怎样神秘，已经写成文字、着了迹象的东西，我们总可以追寻出一个大概的。多设耳目的一项已经叙述过了，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大纲，似乎也不外下列的七种：（1）权势不可假人；（2）深藏不露；（3）把人当成坏蛋；（4）毁坏一切伦理价值；（5）厉行愚民政策；（6）罚须严峻，赏须审慎；（7）遇必要时不择手段。（4）

郭沫若这七条，似乎是给文革中的毛泽东画了一张政治肖像，想想“伟大领袖”的作为，不是每一条都能对号入座吗？

韩非的著作是靠提供对付各种不同人等的阴谋诡计打动了秦始皇的。他说：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5）

这段文言比较直白，核心意思是说，法是公开的，术要深藏不露，以面对众多矛盾，施展阴谋权术驾驭群臣。术的功能是造势，“偶众端”是面对众多矛盾，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用这个办法制服群臣。

韩非认为做国君不必讲究德能服人，才能领众，主要是造势。造成一定的势，平常的人甚至流氓无赖照样做国君。这和毛泽东家天下的谋划暗暗相合，坚定了他传位给江青、毛远新的

决心。韩非引慎到（公元前395～315年）的话说：

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蝼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正贤者也。（《难势》）（6）

引文译成白话是说，腾云驾雾的龙蛇，如果失去云雾的依托，类同地上的蚯蚓和蚂蚁。有德有才的好人屈服于流氓无赖，是因为流氓无赖有地位、有权势。上古最圣明的帝王尧如果是个普通百姓，连三个人都管不了；而夏朝昏聩淫乱的桀当了帝王，可以祸乱天下。弓弱箭飞得远，是借助风力；帝王不贤而令能行，是借助于百姓从众的惯性。尧作为普通人教化百姓，没人听他的；如果南面称王，则令行禁止。可见道德学问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造势得位。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奸劫弑臣》）（7）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古今帝王最大的一次造势运动。他把慎到、韩非关于造势的理论，理解的入木三分，运用的出神入化。他彻底发动群众，采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审查全国的干部，让群众评判揭发各级当权派，哪些是毛泽东的人，哪些是刘少奇的人？他自己“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

毛泽东的大跃进闯下了滔天大祸，饿死了3755万人。他由“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德和才都输了理，失去了领导国家建设的资格，在人民中、在党内威信一落千丈。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美女的怀抱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刘少奇等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在“四清”运动中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4年12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据理力争，不同意揪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毛泽东发生了争论，毛竟然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8）毛泽东不再讲理了。在丢了真理之后，他要占领“势”的制高点。用

强“势”与全党说话，与全国人民说话。

在广州的林彪听说28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公开摊牌的消息后，考虑了一天，29日晚11时，召见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口授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给毛泽东以强有力的“造势”的支持。其要点是：

1964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做最根本的必修课。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9）

这一支持是以凸显林彪的政治分量和权威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堂堂正正，义正词严。林彪四两拨千斤，把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所提倡、所组织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所检阅、所赞扬的军事大比武给否定了。

最微妙之处是毛泽东默许了、同意了这一否定。从时间的巧妙配合上看，这是毛林合演的一出双簧。没有毛泽东的授意，林彪绝不敢如此孟浪，以一票否定军委，以林彪否定毛泽东。军队要练兵习武，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军队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这次大比武毛还亲自检阅、亲自表彰、亲自指示推广。毛泽东所以能够容忍林彪这一动摇毛的权威的“拨正反乱”，是因为林彪主张代替“全军大比武”的是要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毛可能损失的权威，要在这里得到几十倍、几百倍的补偿，此其一；毛泽东正在跟刘少奇摊牌，而刘少奇得到政治局常委多数、政治局多数、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毛有意识地要强化林彪的权威，要强化到能压住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政治局的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为了压住这三个多数，毛认为即使自己的权威受点暂时损失也是值得的。在跟那三个多数摊牌的时候，有林彪和自己站在一起，将极大地加强自己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此其二。

毛泽东胜券在握。在他批准了林彪的“拨正反乱”之后，一个把毛泽东语录当作圣经的带有宗教狂热的所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三百万军队中兴起来了，随后普及到了全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由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就发行了1213万册。军队集中统一，搞一件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地造成声势，加上《解放军报》推波助澜地宣传，很快压倒了《人民日报》和所有地方报纸，更使刊登过批评大跃进文章的报章杂志的领导人胆颤心惊。颂毛成为全国舆论的主旋律。三百万军队天天大造歌颂毛、忠于毛的舆论，这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不久就要到来的决战中，使毛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

这就是法家造势固位理论的“活学活用”。这就是韩非说的“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

韩非是不讲理的，他讲力，有力就有理。“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10）毛泽东搞运动治国就是这种指导思想，能把10%的人发动起来，其他90%的人就得跟着走。回顾毛时代的群众运动，可以说没有一次是正确的，只要群众跟着走，他在党内就占了上风，就处于“力多则人朝”的地位。

毛泽东还从法家那里学得了强迫干部和群众拥护他的办法。“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

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臣》）（11）这个“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就是严惩重罚。在群众语言中有“怕好”之说。一个横行乡里的黑社会老大，百姓见了表示敬意，在市场上拿东西可以不给钱，并不是百姓真敬他，而是怕他，并不是甘心孝敬他，而是怕他砸摊子。这叫“怕好”。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是真心愿意跳忠字舞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早请示、晚汇报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文革中毛泽东把共产党变成了黑社会，他就是天字第一号的黑老大。广大干部和亿万百姓天天喊万岁，90%以上的人并不是真心爱戴他，而是“怕好”。不慎摔碎毛的石膏像，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造成了这样一种天罗地网般的阴森恐怖的势，扭曲了全国人民的心灵和人格。邓拓在自杀之前，在遗书上含泪自责，还不忘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嘱咐孩子们与犯罪的父亲划清界限，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整死你还得叫你发自内心地拥护他，毛泽东就是这么厉害！

#### ◇ 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

在大跃进失败，饿死3750万人的事情发生后，毛泽东出现了皇位（领袖地位）的危机，共产党出现了执政地位（统治合法性）的危机。

毛泽东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要与全党对他的失望、不满作斗争，打击、削弱最后废黜由他选择而又为全党认可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毛有了高于全党利益的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他代表的才是复辟倒退的势力。他推行的才是复辟倒退的路线，他是向秦始皇那里倒退。

刘少奇要纠正毛泽东和党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错误，领导人民度过危机，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争取顺利接班，阻止毛泽东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这是文革势力与反文革势力的共同目标。毛作为领袖、作为旗帜，不能倒，不能动摇，成为重建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舆论导向掀起对毛的个人崇拜之风。毛借力打力，扶持林彪和军队，作为倒刘的基本力量和向家天下过渡的跳板。

利用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势，毛泽东把党权、政权、军权、文权（文化思想领域的所谓话语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为大独裁者。法家关于专制独裁的运用，有提纲挈领的提示：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藉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管仲：《任法》）（12）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六柄”、“四位”的运用，使人瞠目结舌。在党内，他停止了党章，让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靠边站；他没有国家领导人的名份，践踏宪法，囚禁国家主席，停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明明是他篡党篡国，他靠强势宣传，颠倒是非，说他既代表党，又代表国家，是别人另立了“资产阶级司令部”。

高级干部的升降贵贱，去留生死，全凭他一句话，一个御批。  
他可以让总书记邓小平、国家元帅陈毅去工厂当工人。  
他可以让保卫干事王洪文一步登天当了党的副主席。  
他可以让农民陈永贵当副总理。  
他可以让文化泰斗巴金和季羡林去喂猪。  
他可以让江青的机要员小谢（谢静宜）去领导清华大学。

.....

文革中有两个人是必死的，这就是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两个人死盯着饿死3755万人的事情不放，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而且是他向家天下过渡的不可超越的障碍。但叫他们怎么个死法，毛泽东是动了脑筋的。

第一，不能公开处决。公开处决先要撤销他们的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免职，还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定罪量刑，按法律程序肯定杀不了他们。

第二，不能秘密暗杀他们。暗杀这种事情，无论设计多么周密，发布指示者最终都是逃不掉责任的。消灭了他们的肉体，不能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更显得自己理屈，真理是在他们一边。这显不出毛泽东的伟大来。

第三，自杀。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经不起“考验”，自己了断自己。但这两个人特别经得起“考验”，绝不自杀，有病特别配合治疗，他们有这个底气等待最后全党和人民的裁判。

第四，在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中，假手红卫兵害死政敌。这是毛泽东对法家理论“遇必要时不择手段”的创造性地运用。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三，这种施虐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公开的、登报的，足以震慑高级干部，连顶天立地的彭大将军都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上，派出几个红卫兵就把他收拾了，谁还敢出来挡毛泽东的路呢？

我们回顾一个历史镜头，这个镜头作为毛泽东学习法家的“优秀”作业，应该定格在中国历史上。

1967年7月26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两个造反派在北航操场联合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彭德怀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铁牌子，上写“三反分子彭德怀”，名字上划了红叉，被红卫兵押进会场。后面是陪斗的张闻天。北京中伏正是最热的季节，让两个七旬老人低头弯腰几个小时，接受红卫兵口沫横飞的批判。大会结束时，又要两位老人从红卫兵组成的人巷中走出，接受红卫兵的拳脚、吐沫、西瓜皮的批判。这算是既触及了灵魂，又触及了皮肉。然后将彭德怀和张闻天抛上大卡车，由红卫兵押解在北京游街，北京市民惊愕万分。

更残酷的折磨还在后面。8月4日下午，经过江青的精心策划，把彭德怀揪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陪斗的除张闻天外，还有彭的夫人浦安修（她是师大党委副书记）以及师大党委书记、王若飞的遗孀李培之。王若飞也是不赞成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王若飞空难死了，如今折磨他的未亡人，江青有难以言状的快意。

彭德怀看见浦安修低头弯腰被扭上来，心肝俱碎。他发疯一样地叫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浦安修抬头看见了彭德怀，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浦安修嫁了个元帅，确实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入朝作战的第二年，组织上安排浦安修去看望在前线的丈夫。二人一见面，彭德怀竟说：“你怎么来了？几十万志愿军的老婆都没来，你来干什么！”浦安修哭了，但她理解彭大将军的带兵之道，住了两天就回国了。如今二人此时此地见面，大离奇了！这是国民党的监狱吗？不是。这是美军的战俘营吗？不是。这个地方不还是北京吗？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吗？领导这个国家的不还是那个湖南同乡、一起打天下的毛泽东吗？你毛泽东如今坐了天下，不仅失去了党性，为什么连人性都丢了！我彭德怀哪点对不起你？不就是说你大跃进搞错了么……彭德怀正在理解眼前的现实，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青筋暴涨，嘴唇咬出血，坚决抗争，要站起来，被几个彪形大汉踩住小腿，双臂被扭成燕翅，伸向苍穹。

批判发言完毕，又是抛上卡车游街。一顶用铁皮做的两米高的帽子套在彭德怀头上。游斗汽车先在校园转一圈，然后出大门向北太平庄驶去。只见迎面来了一辆红旗轿车，参谋王金岭从车上下来拦住了迎面来的游斗车。“我是总理办公室联络员。你们这样搞是违背总理指示的，必须马上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于是，游斗停止，彭德怀被扶上轿车。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他的权力只有这么大了，稍微减轻一点彭德怀的痛苦。

七、八两个月，彭德怀被批斗一百余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一次次又站起来；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又响起来。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骨被打断，胸部淤血，内伤很重，血压升高。

毛泽东玩的是痞子政治，在这一点上，他连蒋介石都不如。关张学良，杀杨虎城，蒋介石动用警宪特工，敢下手令，敢负责任，敢担千古骂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置。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犯上作乱，让蒋介石栽那么大的跟头，蒋的报复是把张学良软禁一辈子。据张学良自述：“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派了中央医院的（医生）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个最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怀的很，一直还是关心。”蒋介石死后，张学良送一幅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讎。”反观毛彭之间，彭德怀并没有在庐山发动兵谏，把毛泽东抓起来，强迫毛泽东改变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政策，只是写了一封信，对经济形势谈了一些看法，谈不上“政见之争，宛若仇讎”，毛泽东就必欲置彭于死地。毛泽东不敢关彭德怀，更不敢杀彭德怀，借红卫兵之手将他摧残折磨至死。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绝不是怀着崇高的动机犯了错误。什么大民主，什么反修防修，什么追求理想社会，全是欺世盗名。

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打接班人这副牌，将刘少奇迫害致死，提拔林彪又逼走林彪，起用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选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华国锋，给华的密诏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其最终目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

他自比秦始皇，以不可阻挡的底气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宣示，他要搞家天下，谁要妨碍他，就是彭德怀的下场！

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 江青；

总理 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 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 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征询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玉凤的回忆：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画圈，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

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和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各砍一刀，

说：“老师、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13）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这个名单，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即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毛泽东搞家天下的阴谋一曝光，将善良的人们对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高尚动机的种种猜测彻底粉碎了。

1976年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和汪东兴在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王朝、搞家天下的图谋。不管华国锋、汪东兴有什么错误，在中国历史拐点上，他们力挽狂澜，使中国没有坠入封建主义深渊，这一功不应该抹煞。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带头拥立华国锋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不管推举谁出来当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避免了家天下的结局，都是历史的进步。

曾国藩有言：“驭将之线，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挟智术以用世，殊不知世间并无愚人。”

（14）毛泽东对《韩非子》的理解竟不如曾国藩，他想到先秦法家那里寻找灵感，想出奇制胜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由历史罪人再度变成开天辟地的大英雄，他彻底失败了。

注释：

（1）《“批林批孔”运动始末》《红旗》杂志1994年2月号。

（2）司马迁：《史记》《韩非传》。

（3）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第一版第340页。

（4）同（3）第349～350页。

（5）同（3）第340页。

（6）同（3）第353页。

（7）同（3）第350页。

（8）王光美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9）《林彪文选》1967年11月武汉群众组织编辑出版，第119页。

（10）同（3）346页。

（11）同（3）第370页。

（12）《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编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0月版第128页。

（13）《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据2004年5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东兴、毛远新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究，认为是可

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毛泽东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玉凤。这件事情张玉凤是不敢编造的。说出来除说明毛泽东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希望有关部门敦促仍健在的毛远新、汪东兴出来证实或证伪。这是毛泽东搞家天下的唯一铁证，中央档案馆是不会有另外的材料的。

（14）《曾胡治兵语录》，大同书店中华民国30年10月15日再版《古代兵经》下册第13、15页。

2009年2月

~~~~~

【春秋史笔】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文摘（之二）

• 周良宵 • 顾菊英 •

第五卷 1965年12月8日（罗瑞卿被黜）

12月8日—15日

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会议印发了叶群带到杭州向毛告发的材料及林的亲笔信。叶群在会上作了长达11个小时的揭发。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0日），把在西南视察的罗瑞卿专机送来上海，隔离反省。周恩来、邓小平被指定找罗谈话，“罗不但没有老老实实检讨错误，反而表示了委屈，多方为自己辩解。”于是，成立“中央工作小组”继续处理。

〔按〕罗瑞卿与林彪的矛盾，始见于1964年以来解放军中开展的大比武运动。罗瑞卿是这一运动的积极提倡者。林彪则在1964年11月30日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强调突出政治；接着，一再批评军事训练冲击政治思想工作。罗瑞卿则屡予反驳，积怨难解。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是完全支持林彪的。因此，他指责罗反对突出政治，是折中主义亦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视罗为敌人。又据，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谓：罗瑞卿“反对毛把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他认为毛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背离了起码的军事常识。罗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对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希望。他指出：为了越南的利益，应进行‘联合行动’。”“罗尊重苏联，相信社会主义同盟，亲欧（苏），在越南问题态度上强硬。”（第382页）罗瑞卿是否真是在对苏问题上构成反毛的罪状，如特里尔所云，尚值得研究。然当时毛的反苏狂热一再加剧，完全不顾策略地把苏联视同甚至比美国更可怕的敌人，反美反苏，两个拳头出击，许多人对此在认识上是有保留，情感上颇勉强，特别是在战略上则是有怀疑和顾虑的。毛对此十分敏感与警惕，也是很自然的。

又据文化大革命中揭发：1965年11月，苏联将召开23大，彭真是主张派代表团参加的。并曾亲自动手起草参加23大的报告。此事经毛反对而作罢，“彭就指使黑帮分子辛毅在家里秘密接见了苏联大使，密告说：‘最近我们要发表文章（指《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发表了就不好说了，趁没发表说一说。’彭还向苏修泄露了国家大量机密，讲了工业布局、三线建设、城市人口疏散、四清运动等情况。”在对苏问题上，彭似乎是与毛有分歧，而彭、罗之间在这方面观点则是接近的。

罗瑞卿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位牺牲者。但他是通过传统的拜占庭宫廷政变方式被打下台的。其总参谋长一职，由原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代理。



《非凡的年代》引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回忆：除周恩来外，甚至连刘少奇事先也不知道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刘在抵上海后“跑来找贺老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又据1979年谭震林回忆：“那个会我参加了，可会上没有讲罗瑞卿的事情啊！我们是莫名其妙啊！关于罗的问题一直没有讨论，但是常委讨论了没有，就不清楚了。”

12月8日

《红旗》第13期发表戚本禹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点名的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观。陈伯达曾帮助修改。文中横指翦伯赞的历史观点是“现实阶级斗争在史学界的反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判定翦伯赞是“近几年来史学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尖锐斗争中资产阶级一方的代表人物”。

〔按〕翦伯赞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61年12月22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2年5月4日在《江海学刊》发表《目前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针对当时史学界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极左派批评翦否认阶级分析和阶级观点，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研究历史，反对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污蔑农民与农民革命，鼓吹“让步政策”，美化地主阶级。戚本禹的文章就是其集大成而无限上纲者。当时颇曾流行所谓“让步政策论”，认为在农民起而反抗，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农民力量超过封建主阶级时，封建主阶级有可能被迫让步，采轻徭薄赋，安抚农民，以稳定统治。“让步政策论”的发明权据考证应归于陈伯达，49年以后则为史学界广泛引用。1965年孙达人撰文，就“让步政策”进行批判。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陈伯达等的讲话中曾说：“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批判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就是以污蔑农民战争、鼓吹让步政策为主要罪名，以极左的狼牙棒，大张挞伐，意在与姚文元相互配合，南北呼应。毛泽东颇为欣赏，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据师东兵《1965年秋冬的北京与上海》一文（载《中国在这里沉思》）记载：戚文发表后，彭真曾约见他，说：“看了你的大作很感不安。照你所说：历史研究只能为某些政治口号服务了。我们党可是从来没有这样提过。你那样写是不是合适呀！”戚表示，是“他们硬是要我那样写。而且我的文章是陈伯达同志帮助改过的。”第二天，戚本禹写信给彭真：“最敬爱的彭真同志：我在未和你谈话之前，心里很紧张。可是当你亲切地接见了，并对我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后，我的紧张感全部消失，就象到了自己家一样。我渴望进一步得到您的帮助和指导。戚本禹敬呈。”这条政治上的小爬虫，投机趋附之态，跃然纸上。据传此件在彭真被抄家后送到了江青手里，导致了戚本禹最后锒铛入狱。

第六卷 1965年12月12日至31日（毛泽东杭州讲话）

12月21日

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2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陈伯达立即将讲话内容通知江青。

〔按〕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该剧与1961年的所谓三风（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联系起来。这犹可视为是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所谓右倾思潮的批判。毛则亲自点明：海剧的要害是“罢官”，海瑞就是影射彭德怀，吴晗的罪行是为1959年被罢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鸣冤翻案。问题的严重性便远远超出一般的思想批判。彭德怀在1959年

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毛在盛怒之下，一反会议原定反左纠偏的主旨，改为继续反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使极左的灾风在全国火上添油，铸成历时三年的大灾难。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刘、邓如实地对大批在极左跃进中被加害的干部与群众平反。然对彭德怀则仍认为罪在不赦。在七千人会上，刘少奇的讲话中就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问题在于彭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并指责彭为高（岗）、饶（漱石）余孽。（毛泽东、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有一个“高、彭（德怀）联盟”（毛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彭德怀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不服，在1962年6月16日写成“八万言书”，请求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毛认为这又是一起严重的翻案事实，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事隔三年多，1965年9月23日，毛亲自召见彭，委以“三线”副总指挥任务。并当面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你也不要发牢骚，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变。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么！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要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我没有忘了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对此，彭德怀极为感动，11月27日离开他在京的贬所挂甲屯吴家花园，奔赴成都，全力投入工作。然就是在这同时，毛已授意江青组织姚文元写成文章，对吴晗的《海剧》进行批判。66年2月8日毛在彭真向他汇报时，还亲自质问彭：吴晗走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同时，一个名为“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正奉毛之命加紧审查。（戴煌《牢记“造神运动”教训》）这就无论如何不能把毛对彭德怀的谈话看作是诚实的致歉。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运用权术，把彭暂时调出北京，并在同时调出黄克诚为山西副省长。从现有的资料看，为了发动这场重返一线的政治冒险，毛泽东是作了周密的战略准备的。罢杨尚昆，由自己的亲信汪东兴掌握中共中央办公厅；黜罗瑞卿，把军权牢牢掌握在林彪手中；向彭真与陆定一发难，动摇其基础，然后直指刘少奇以消除这一劲敌。这就是毛对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计。由于将突破口选在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身上，欲行罗织的罪名将牵涉到被罢官的彭德怀，所以，把彭德怀先调离北京，也是扫清突击通道的必要准备。于是才有9月23日的一番表演。毛彭之间，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毛认为彭在他死后会造反，故意必根除。（参见《黄克诚自述》）1959年以后的发展越来越证明彭的意见书是正确的。然彭越是正确，毛就越不能容忍。《三国志·魏书·袁绍》载袁绍南攻曹操，他的忠实谋士田丰极力谏阻。“绍怒甚，以为阻众，械系之。”官渡之战，袁绍大败。“或谓丰曰：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毛泽东的气量并不比袁绍好。彭德怀的悲剧正在于真理在他一边。如果后来的事实证明彭德怀是错误的，他的命运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吧！又据李志绥的回忆录，在毛放纵的性关系上，57年彭德怀直言进谏，说毛不应搞“后宫佳丽三千人”，因而解散警卫团文工团（《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90页）。亦可见两人间夙怨甚深。刚正不阿的彭德怀，终必不容于睚眦必报的毛，则另外的结局恐怕也是不会有的。

12月22日

彭真、康生、杨成武在杭州受毛泽东召见。毛重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摇头插话：“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与个人关系。”并与康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2月23日

应彭真的要求，毛泽东单独会见了彭。彭极力为吴晗辩护。最后，毛表示：先按你们议定的办吧！再快也得两个月才能作政治结论。

12月25—26日

彭真赶往上海，为毛泽东庆寿（七十二岁生日），席间与张春桥会面。彭责问张：“你们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你们的党性跑到哪里去了。”“你记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行了。到时候我们自有讲理的地方。”祝寿宴上，毛泽东要求彭真“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深一步。”25、26两日间，彭真听取了上海市委的汇报。

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布置为五本经典著作写序言，谈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就是海瑞。

[按]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公开点名在政治上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民主党派的高级负责人，必须征求北京市委的意见并有中央的决定。彭真完全有理由指责姚文的发表是非组织活动。中央与北京市的报刊也完全有理由不转载一个地方刊物上的文章。彭真绝不是不了解姚文的背景，但他直至杭州之行以后，仍有恃无恐，正是因为他认为按组织原则并通过正常程序来解决时，他是有理有据的。张春桥则以“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据作为《5·16通知》附件的《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以尚方宝剑作依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个人与组织的对抗。毛泽东为了贯彻其个人的意志，只有抛开甚至摧毁共产党在第一线当权的现行组织。为了无所顾忌地抛开或摧毁这一组织，就必须无限地张大个人的权威，同时诉诸广大群众的支持。这就是当时的形势。

12月27日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否认与“单干风”与“翻案风”的关系。

12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一文。这是由中宣部周扬、林默涵组织林润青、龚育之写的文章，对“清官”进行讨论，贯彻彭真引向学术批判的战略意图。

12月30日

康生在向上海的毛泽东告密。“主席：据可靠消息证实，彭真在1961年11月间，指使邓拓、项子明、李琪等人跑到西郊公园畅观楼检查中央1958至1961年下发的所有指示文件，查找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所谓‘问题’。联系到吴晗的《海瑞罢官》，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一系列的反常活动，联想近几年积极上书，迫不及待的翻案表现，初步断言，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篡权步骤。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请主席深思、决断。康生呈”据江青说：此信陈伯达看过，并由他专人送与江青转呈。毛泽东阅后，嘱在场的江青、张春桥严守机密，任何人不得外传。随即点火焚毁。并通知秘书，电召周恩来、林彪在明天，即1966年元旦来上海见他。（《1965年秋冬的北京、上海》）

[按]所谓“畅观楼事件”，据文化大革命中所揭是：1961年11月，彭真令市委秘书长项子明：“你看看几年来中央文件中有什么问题，看看他们头脑里干了些什么事情？刮五风的文件有没有？要找出问题，整出材料。”他让项子明找些“头脑清楚的人，一份一份的看。”由邓拓负责指导。项子明与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市教育局局长张文松等十余人参加了这一工作，查阅了1958年以来的中央文件，“寻找中央和毛主席的所谓‘错误和缺点’。”“他们对1958年成都会议以后中央的指示和中央批转的有关报告，逐份地作了审查，凡是计划指标，均被他们诬蔑为‘浮夸’，‘不实事求是’。甚至连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指标，也被诬蔑为‘高指标’。凡是提到‘全民办’、‘大办’的，以及强调‘群众运动’和‘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统统被他们指为热。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毛主席‘头脑发热了’。胡说：‘五风与人民公社有关系’。‘大、中、小并举’是不对的。甚至恶毒地污蔑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他们经过十多天的地下活动，从文件中找到了所谓‘问题’以后，写了近二万字材料，名为《中央文件摘要》。《摘要》印好后，以‘绝密’件分别送给彭真和旧市委书记处成员。”这份揭

发材料还提到，“畅观楼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杨尚昆就在邓小平的指使下，让中央办公厅查阅1958年以来中央的文件。”（《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真罪恶史》，市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编）文化大革命中揭发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在1961年也曾秘密审查1958年以来的中央文件。这都是58年以来党内就所谓“三面红旗”在台面下进行互斗的反映。

~~~~~

## 【文献资料】

### 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个同志。

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思想的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斗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是剥削阶级对学术文化的垄断地位，而且要从进入一个广大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

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的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坚持下去。

#### （二）方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的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的驳倒和摧毁他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事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和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等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或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洁明了。

### （三）队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

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分工分头执笔，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要重视在斗争中出现的优秀的青年作者，加以培养和帮助。

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方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只要错误已经改正，或者决心改正就好。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批判和自己的前进。

（五）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

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

## 【前事不忘】

### 从德国经验看文革

• 苏晓康 •

官方在最权威的公共空间保护着毛泽东这个“象征”，就保护了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里的“小毛泽东”——“同谋与受害者”这个双重身份就不会瓦解；文革之后又一再加固了必须保住“毛泽东”这块神牌的思路，因为他就是这个政权的来源。

今年法兰克福书展很热闹。胡杰制作的卞仲耘死难纪录片《我虽死去》，被译成德语上了书展，由一个小出版社译制，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 Schwiedrzik），据说曾经是个“毛分子”，他的妻子则是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大学汉学家苏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间留学北京，学的是中共党史。据说他们夫妇看了这个纪录片，很震动，找到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联络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还写过一篇《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在网上很流行。（见本刊 z k 0 6 0 5 a ——编者）自然，此文拿德国经验（纳粹）跟中国的文革经验作对比，无疑极有价值，尤其她作的是关于罪与责的对比。我想，没有哪个民族比德国人更有资格谈这个问题。

#### ◇ 同谋与受害的两面性：中德类比

假如我的理解无误，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希特勒曾使每一个崇拜者获得满足，由此也导致所有德国人都自觉是受害者，而拒绝面对真正的受害者；这种同谋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或“两面性”，曾是一个重大障碍。

这种“双重身份”的德国式尴尬，套用到中国官方的身上，果真非常合适——“存活下来”的邓小平为首的整个中共体制，它的全部官员（走资派），当然也包括“保爹保妈”的高干子弟们，既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帮凶；更典型的，还要算是“副统帅”林彪集团、“小爬虫”王关戚等，但没能存活下来；不知道“四人帮”和陈伯达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国人怎么界定戈林元帅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

至于民间，魏格林认为处于一种“记忆群体”分散、割裂状态，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讦，

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这个观察很准确，但是没说原因——因为她不会知道，这恰好是官方所乐见的一个局面。

#### ◇ 毛泽东杀的都是本民族同类

说实话，西方汉学家看中国或中国历史，总会给人感觉隔了一层什么，何况文革这种云山雾罩的历史呢？魏格林能看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火眼金睛”。不过，我还是想指出她某种“隔”的东西。

首先，主席与元首的区别——德国人跟希特勒的关系，与中国人跟毛泽东的关系，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毛泽东从来没有让所有中国人都“自我满足”、自豪过，恰好相反，这位枭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依次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跌入地狱，饱尝挫折感、罪恶感、“另册”感，他用“运动”群众的这个法宝，变着花样挑动中国老百姓互相批斗，把中国变成一座“古罗马斗兽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希特勒绝对没有的一种兴趣，大概汉学家们也很难了解，若是曾经雾里看花地崇拜过毛泽东的，就更难了。

还有一层不同。纳粹歧视非日耳曼人，专杀犹太人，也有个专用名词，叫着“种族灭绝”（genocide）；可是斯大林、毛泽东杀的大多是自己党内的竞争者、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老百姓，这该叫个啥，好像还没人发明个词出来。这个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使“同谋加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更加暧昧，直接影响魏格林说的整个民族的“道德记忆重建”。

#### ◇ “全民族遗忘运动”

不可忽视的还有，在现实体制层面，第三帝国彻底崩溃，希特勒没有任何继承者存活下来，这使得德国人的反省没有任何制度的阻力。这在中国恰好是一个相反的情形。魏格林问道：“年轻一代为何不强烈要求公开讨论文革的问题，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可是，为什么她没有问：“中国当局为什么至今不允许公开讨论文革？”而且，中国当局在“六四”以后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遗忘运动”，难道是国际社会和西方汉学界视而不见的吗？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除了还知道毛泽东是谁，对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一概闻所未闻，连二十年前的赵紫阳都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么一个民族，你还指望她有道德记忆，不是异想天开吗？

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还躺在对面的纪念堂里——请一个德国知识分子设想一下，假如二战之后希特勒在德国还仍然享有这样的待遇，德国民族还能反省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罪行吗？他们还有能力认识“为什么大多数人违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跟着伟大领袖走”吗？中国官方在最权威的公共空间保护着这个“象征”，就保护了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里的“小毛泽东”——“同谋与受害者”这个双重身份就不会瓦解；毛泽东就依然俯视着中国，而在他的注视之下，人们就不必理会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后的一幕幕历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须保住“毛泽东”这块神牌的思路，因为他就是这个政权的来源。其实问题没有那么深奥：德国民族跟着希特勒毁灭过一次，中国则没有。

□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10月号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